

家务与星空

文学与性别研究

降红燕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13028259

10-53

33



家务与星空

文学与性别研究

降红燕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航

C1634802

10-53
3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家务与星空:文学与性别研究/降红燕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 - 7 - 5161 - 2160 - 3

I. ①家… II. ①降… III. ①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971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孙 丽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203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辑

关于“超性别意识”的思考	(3)
“女性文学”还是“性别文学”	
——“女性文学”及相关概念辨析	(13)
男女作家写作模式差异及其文化意味	
——以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和张弦《被爱情遗忘的 角落》为例	(24)
性别与男女平等	(35)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	(43)
内聚焦在女性小说中的运用及其文化意味探析	(70)
中国女性小说中的“家”	(80)
消费时代的女性幸福神话解析	
——以微电影《家居的美好一天》为例	(90)

第二辑

梦莉散文的女性视角	(103)
纳西女人的生命歌吟	
——《情死》中的女性形象解读	(112)

2 家务与星空 ☆

冷月映照下的花魂

- 白山《冷月》读记 (120)

故事·人物·性别·战争

- 半夏小说《螺旋结构》解读 (124)
- 《小城三月》的症候式分析 (130)
- 《甄嬛传》:性别之战 (138)

第三辑

- 简述《女权主义文论》 (145)

从单纯轻盈到丰厚沉实

- 简评盛英的女性文学批评 (148)

徜徉在城市间的布衣

- 读谭湘 (154)

- 女性文学研究界的盛会 (159)

云南女性文学研究的“创造工程”

- 评黄玲的《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云南当代女性
文学综论》 (163)

女性文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 第九届中国女性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67)

文学与性别研究领域的新收获

- 读毕新伟《暗夜行路:晚清至民国的女性解放与
文学精神》 (177)

- 关于“女性文学”课程教学理念与实践的探索 (181)

第四辑

- 阅读冰心 (191)

- 家务与星空 (194)

- 何处是归程:从林道静、丁玲说起 (197)

- 后记 (202)



第一辑

关于“超性别意识”的思考

1996年10月，在南京召开了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和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超性别意识”是会上争议得最为热烈的一个话题。它几乎成为这次会议“回顾与重建”主题下最为具体的一个中心议题。会上对“超性别意识”的一系列问题有所涉及，但两天的时间太匆匆，不及作具体深入的分析，本文想就这一概念及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梳理和探讨。

什么叫“超性别意识”？

就笔者目力所见，这个词是由当代青年女作家陈染先提出来的。1994年，陈染在《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一文中明确使用了“超性别意识”这一语汇。在文中陈染首先（也主要是）从爱情谈起：“我的想法是：真正的爱超于性别之上……”，“人类有权利按自身的心理倾向和构造来选择自己的爱情。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东西！”“异性爱霸权地位终将崩溃，从废墟上将升起超性别意识。”结合陈染的创作实际，可以看出，她所谓的“超性别意识”是在为自己的作品做注解。因为陈染作品中不仅写了异性爱，也写了大量同性间的姐妹情谊，如《无处告别》、《潜性逸事》、《麦穗女与守寡人》

以及长篇小说《私人生活》等。不过陈染并不仅仅限于爱情上来使用“超性别意识”这个词，她从爱情又回到了艺术，回到写作：“我上边所说的，不是我个人的心理倾向，更不是我个人的生活，而是作为一个作家观察世界的方式。我努力在作品中贯穿超性别意识。”她接着说：“真正优秀的艺术家、文学家，不会轻易被异性或同性所迷惑，她（他）有自己内心的情感追求和独立的艺术探索。”^①从陈染的以上表述可以看出，“超性别意识”是要超越单一的性别视角来观察世界、看待生活。

更能传达“超性别意识”思想的是铁凝，尽管她没有使用这个词。铁凝在谈到自己的女性题材长篇小说《玫瑰门》时说：“我本人在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目光。我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叫做‘第三性’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况。……当你落笔女性，只有跳出性别赋予的天然的自赏心态，女性的本相和光彩才会更加可靠。”^②这段话可以视为解读《玫瑰门》的一把钥匙。在这部铁凝自视为“迄今为止我最重要的一部小说”中，出现的主要人物不论老少都是女性，作品有对女性的赞美，更有对女性的无情暴露和鞭挞。《玫瑰门》已走出我国当代早期女性文学作品中惯常出现的男女性别对抗模式，增强了对女性缺陷的自我审视和批判意识，显示出一种超越女性性别意识的胸襟和气度。

表露过类似看法的还有其他一些女作家，虽然表述方式和措辞不尽相同，但中心意思是一致的：写作（创作）应该超越单纯的某种视角，不能只以纯粹的男性或女性目光来看待生活，而要用“双向（第三性）视角”（铁凝），要具有“超性别意识”（陈染）。

“超性别意识”的提出得到了理论批评界的响应和首肯。第二届研讨会上，研究者刘思谦女士在提交会议的论文《女性文学的价值目标》中就明确指出：“女性文学……虽然以性别命名，其内涵与生命的活力是超越性别的，其生产和发展是历史的。”另一研究者盛英女士在会上

^① 陈染：《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见《断片残简》，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127页，原载《钟山》1994年第6期。

^② 铁凝：《铁凝文集·玫瑰门·写在卷首》，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发言中谈到女性文学的发展方向时，也认为应该是男女互补互动，男性女性双向共建。这样的观点其实也并不陌生，还在1987年我国出现的较早的女性文学研究著作《女性主义文学》（确切地说是一本小册子）中，著者孙绍先在考察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历程，指出女性主义文学的困惑并预测女性主义文学的走向时，指出：“女性既不应该继续做父系文化的附庸，也不可能推翻父系文化重建母系文化。出路只有一条：建立‘双性文化’。”^①几年以后，刘慧英女士在其专著《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此书1995年出版，但在1993年写就）中也提出：“我反对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我也不赞成男女两性长期处于分庭抗礼的状态之中，我比较赞赏西方某些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建立和发展‘双性文化特征’的设想，它是拯救和完善人类文化的一条比较切实可行的道路。”^②“双性文化”和“超性别意识”用词不同，但两者传达的思想大体是一致的。从此看，女性文学研究者“超性别意识”的提倡并不比女性文学写作者晚。

— —

为什么女性文学写作者和研究者都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提出了“超性别意识”？或者换句话说，“超性别意识”的提出意味着什么？

“超性别意识”的提出是我国女性文学发展的必然。

“女性文学”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女性文学创作和女性文学研究。从创作实践看，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创作是从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开始的。五四运动中，伴随着文化启蒙，女性意识觉醒，出现了一大批表现女性问题的作家作品。40年代至7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女性意识处于被遮蔽的隐匿状态。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和整个文学一样复苏，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高潮。从

^① 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页。

^②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15页。

理论层面看，我国当代女性文学研究是在对外开放西风东渐的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具体地说是在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传入我国之后。虽然早在1928年，丁玲就发表过《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样富有极强女性意识的作品文本，但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研究，则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事。1995年借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东风，迄今只来得及召开过两次研讨会。

我国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历程虽不长，作家作品却极为繁富。很多论者都趋向于把我国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分成三个阶段^①：70年代末80年代初；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以来。第一阶段的代表作家作品有张洁《方舟》、《祖母绿》，张辛欣《我在哪儿错过你？》、《在同一地平线上》等；第二阶段有王安忆及其“三恋”、《岗上的世纪》，铁凝《麦秸垛》、《玫瑰门》等；第三阶段有陈染《私人生活》，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等。早期的张洁、张辛欣把她们的笔伸向女性的心灵世界，展示了生活于现实社会中的职业女性在事业与家庭中的两难困境，这种困境具体展现为女性与男性之间尖锐的性别对抗。到王安忆、铁凝，则扩展了张洁、张辛欣的表现领域，不只写女性纯精神的心灵世界，也把女性肉体的觉醒带入了文学作品。在她们笔下，女主人公不再是似乎整天都在进行精神追问的探寻者，而是活生生的有精神向往也有肉体欲望的女人。男女性别对抗已没有张洁、张辛欣那么紧张。发展到90年代，女性写作呈现出个人化、私语话的特色。陈染、林白、徐小斌等避开开热烈沸腾、纷纭扰攘的现实社会生活和外在客观世界，潜入自己的内心，抒写自己的情感体验、沉思冥想，并有张洁、张辛欣回避的性心理乃至王安忆、铁凝虽已触及也未偏重的性生理，也即法国女权主义者埃莱娜·西苏所谓的“躯体写作”。在第三阶段女作家的笔下，被凸显聚焦的是女性个体，女性个体成为作品表现的中心和主体，男性被彻底逐出或只作为若有若无的背景出现。

纵观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我国当代女性文学创作是活跃、蓬勃的，很多人也在赞扬肯定女性文学，但是女性文学也一直处于

^① 如王干、戴锦华《女性文学与个人化写作》，载《大家》1996年第1期；王光明《女性文学：告别1995——中国第三阶段的女性主义文学》，载《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一种被质疑和批评的境地。前述所列举的作品几乎没有一篇（部）不在文坛上引起争议。早在《女性主义文学》中，孙绍先就把中国从古至今的女性主义文学概括为“寻找男人”的文学，而新时期从1979年到80年代前半期（相当于第一阶段）的女性主义文学则处于“嘲弄心理阶段”。甚而至今还有人把张扬女性意识的女性文学说成是“仇男文学”^①，照此理解，张洁、张辛欣的作品成了典型的“仇男文学”文本。从女性心灵的挖掘深度看，王安忆、铁凝显然比张洁、张辛欣还进了一步，对男女性别对抗模式有所超越，但她们也遭到了质疑：“在‘三恋’和《玫瑰门》中，我们不仅看不到清丽优美的风格，也看不到那种真诚地发自心灵深处的情感力量对于小说世界的观照和渗透，以及蕴含于人物之中的审美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三恋’和《玫瑰门》是王安忆和铁凝为突破而突破，为深刻而深刻的创作心态下的产物。”^② 90年代女性个人化、私人化写作则几乎处在一种被“围剿”的状态下，尽管有人也对林白、陈染的作品持肯定态度（如戴锦华、徐坤），但批评的声音是主潮。有人认为这些作家进行的是“阴影下的写作”，作品是“阴影下的作品”^③，有人则称为“怪女人文学”^④。中国的女性文学创作一直是在一条布满荆棘的坎坷道路上艰难跋涉，是在困境中发展的。女作家们提出“超性别意识”可以视为突围困境的一种努力。

女性文学研究者提出“双性文化”，则更多的是对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移植和借鉴。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是更广泛的女权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女权运动自本世纪以来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女权运动的纲领是男女平等，但发展到后来一度变成男女对抗，一些极端的女权主义者几乎成了“反家庭者”、“逃离母职者”和“女同性恋者”等的代名词，这使女权运动走入了歧途。到80年代出现的新一代女权主义

① 王彬彬：《“女性文学”两极》，载韩小蕙主编《新现象随笔二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0页。

② 唐晓丹：《新时期文坛上的双子座——简论王安忆和铁凝创作流变中的契合现象》，《当代文坛》1992年第5期，第6页。

③ 艾英：《我读女作家》，《中华读书报》1997年1月15日。

④ 王彬彬：《“女性文学”两极》，载韩小蕙主编《新现象随笔二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1页。

者则不再强调男女的对立，消弭两性间的冲突、对抗，推进爱、温情，主张走向双性和谐^①。（还有论者把80年代以来很多男性对女权主义的批评和女权主义者的自我反思看作是一种男权的回潮^②。）

这些年来，随着对外开放，西方文化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参照系。文学创作上如此，我们几乎把西方要花一百多年走过的文学历程在新时期以来的一二十年中演练了一遍；文学理论、批评上也如此，在20世纪西方文论的各种派别中，从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学、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到接受美学、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等都被“拿来”了，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也在“拿来”之列，其中当然也就包括了“双性文化”思想。

三

“超性别意识”的提出有什么意义？应不应该“超”？又是否可能“超”呢？

从终极关怀的意义上说，“超性别意识”是女性文学（应该不限于女性文学而是整个文学）的发展方向。女性文学创作是女性为自己沉默了几千年的历史发出的呼喊，女性文学研究是挖掘文学史中被埋没掩盖了的女性声音。但是女性文学的终极目标并不是推翻男权统治，把男性赶下宝座，自己再戴上王冠，把“男尊女卑”改为“女尊男卑”。女性文学的终极目标是要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双性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双性文化”是应该提倡的，“超性别意识”也是应该具有的。但是还应该看到，在我国现阶段的情况下，“超性别意识”的提出可以理解，然而不宜把它作为女性文学的创作信条，评论界若拿“超性别意识”来作为衡量作品的标尺，还会在某种程度上压抑女性文学创作，甚至成为横亘在我国女性文学本已艰难的路途中的一个障碍。我的这种看

① 参看王岳川《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女权主义批评》一文，载《学习与探索》1993年第1期。

② 张宽：《男权回潮》，载《读书》1995年第8期。

法，是在对“超性别意识”的概念内涵和我国当前女性文学创作情况作进一步辨析之后得出的。

前面已经提到，“超性别意识”的含义是要超越单一的性别意识，用一种既不同于男性也不同于女性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理解生活。但这只是字面上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超性别意识”是女作家提出的，为女性文学研究者首肯的，是针对女性文学而言的，它的所谓“超性别”，似乎是超越男性性别和女性性别。但实际上主要是偏重超越女性性别。在此我们不妨重温一遍铁凝的那段话：

我本人在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目光。我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叫做“第三性”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况。……当你落笔女性，只有跳出性别赋予的天然的自赏心态，女性的本相和光彩才会更加可靠。（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处处针对“女性”而言，处处强调的是超越女性性别。可见，“超性别意识”的内涵实质主要是“超越女性意识”。

那么，什么叫女性意识？又是否应该超越女性意识呢？

“女性意识”也是一个有很多言说又尚无定评的概念。要言之，女性意识就是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是认识到女人和男人一样也是人、是人类的另一半的意识。女性意识是衡量一部作品是否为女性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志。

女性意识的觉醒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人类有史以来的几千年，一直是父系文化占据着统治地位，女人们一直处在历史文化的边缘位置（除了在远古母系氏族社会扬眉吐气过短暂时日外）。英语中“人类”是 human，“历史”是 history，人们一直认为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具体到我国，中国妇女所受的压迫更为深重，从“三从四德”、“七出”、“缠足”、“纳妾”等封建纲常和现象中就可以看出女性处在一种怎样水深火热的境地。今天的妇女是大大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思想指导下，我国妇女的地位大大提高，男女实现了同工同酬，国家从法律上保障了妇女

的经济权益和社会地位。但物质的解放必然带来精神的解放，社会地位的提高就意味着文化心理的提高吗？正如戴锦华女士指出的：“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很高，但女性意识很低。”^① 女性意识在目前不是溢满得应该超越了，而是张扬得远远不够。在广大妇女中的许多人还搞不清楚何谓女性意识，或者说很多人的女性意识还未被唤醒时就谈超越女性意识，这是否太匆忙了些？也太简单化了些？

行文至此肯定会有人诘问：“超性别意识”并不是外人强加的，而是女性文学写作者和研究者自己提出的，你的观点和她们不是矛盾的吗？确实如此，但矛盾只是表象。在此还应该对“超性别意识”提出的原因作进一步分析。

女性文学写作者提出“超性别意识”，是突破困境的一种努力，也是中国现当代女作家的一种惯有的创作心态在90年代延续的具体表现形式，这种创作心态是女作家不甘于只作为女作家而是女作家。

中国的女性文学和西方不同，就是没有过一个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背景，这注定了中国的女性文学创作从未独立于文学关怀社会的总体格局。王蒙在回答外国女性提问时的一段话可说是中国女作家的一种真实的心理写照：“我们的女作家很多，又都很棒，比男作家还要棒。她们是作家而且是极好的作家，她们领风骚于整个文学界而不限于文学女界；她们不是也不甘心仅仅只是女作家哪怕是极好的女作家。”^② 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变化，可以看出丁玲创作历程是从女性意识的显现宣泄走向女性意识的消失隐匿^③。新时期的张抗抗、张洁、王安忆都明确表示过不是也不愿被人视为女性主义者，和王安忆有类似的经历和写作背景的铁凝提出“双向视角”也就不足为怪。陈染已不讳言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了：“我想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我的立场、我的出发点，我对男性的看法，肯定都是女性的，这本身就构成了女性主义的东西。”但陈染还有一个看法：“人类是什么呢？不就是由个人组成的吗？‘我’就是人类之一。”陈染认为个人化写作不仅

① 参见红娟《以平等的心态抒写性别——访学者戴锦华》，《中华读书报》1996年2月14日。

② 王蒙：《说〈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读书》1995年第1期，第57页。

③ 参看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第五章第二节“从宣泄自我到自我的隐匿”。

仅是个人的生活：“能够有所呼应的‘个人’其实就体现了一种共同性。”^①也就是说，她充满强烈女性情绪，女性体验的个人化写作是全人类的，全人类的自然就是超越性别的。从这一角度看，“超性别意识”是女作家们显示自己视野开阔、境界高远的一种自我表白。

但是在目前，女作家们果然能完全超越女性意识吗？她们是女性中的先觉者、警醒者，如果她们都不再为同性呼喊了，那么女性文学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和价值呢？在第二届研讨会上，女作家胡辛明确宣称她就是为女人写作的；王晓玉谈到她在创作时很少有“我是女作家”的框子指导着创作，但上帝既把你造成女人，你就必然在写作时投射进女性意识；林白说她受到组委会邀请与会非常高兴，像听到了某种召唤，女性文学对她来说有一种亲切感。那么，抑或“超性别意识”只是女作家们用以防身的一个盾牌、一种理论武器？她们不想也不可能超越女性意识？

女性文学研究者较早对“双性文化”的提倡是对西方女权主义文论的移植，后来对“超性别意识”的首肯则主要源于对90年代我国女性写作的忧虑。

陈染、林白等人的作品确实显示出和早期女作家的不同，那就是“性”的直入作品。在有“洁癖”的张洁的笔下，爱情就是精神之爱、灵魂之爱。《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女作家钟雨和老干部爱得刻骨铭心，但他们连手都没拉过，只等死后灵魂到天国相聚。王安忆、铁凝开始从情爱涉笔性爱，但她们也主要是从心理角度切入。而陈染、林白则坦率、大胆得惊人，什么同性恋、手淫等统统从她们的笔端泻出，这样“让人忧虑的放纵”（谢冕语）当然遭到了一些人的抵制批评。但是如果仅从性描写的角度看，仅在新时期陈染、林白之前（或同时）就有《废都》、《白鹿原》、《丰乳肥臀》等，《一个人的战争》、《私人生活》并没有超过这些作品，这些作品虽也在评论界那里引起争议，但远未达到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人们之所以对后者惊呼只在于作者的性别，女人也敢写性了（岂不是翻了天了）。其实恰恰在这点上，陈染、林白显

^① 参见林舟、齐红《女性个体经验的书写与超越——陈染访谈录》，载《花城》1996年第2期。

示了她们对男权文化、男性意识强烈的反叛意识：“性”不应再是男性作家的专有领域，女人和男人一样是人，男作家能写的，女作家应该也能写。从某种意义上说，女作家这种越出规范的举动正是对女性意识的一种张扬。那么，评论界对女性写作是否应该不说宽容大度至少也应客观、公正一些呢？

当然，批评家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陈骏涛先生一再指出，女性文学真正视野开阔的大手笔、大作品还太少，女性文学需要提升，一己的感情波澜并不能代替大千世界的风云变幻^①。陈骏涛先生的意见对女性文学存在的不足可谓一语中的。具体到女性私人化写作，某些作品确实在接受大众那里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尽管这种影响还可以进一步分析。90年代，整个文学置身于市场化的商业浪潮之中，商业利润在出版者和写作者那里成为一个重要的驱动力，“性”是获利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又是女作家写的，自然更不同一般。因为在传统文化中，女性基本上作为“性”符号，作为“被看”而存在的，“女作家是被看中的被看”。商业化操作使得陈染、林白们主观上的反叛举动客观上恰恰满足了一些人的窥视欲，这是接受者也是写作者的悲哀。但是作家们在这其中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作为创作者，女作家不能不考虑到大众在接受水平，不能不考虑国情，心中应该有个度，下笔时应有所节制，否则不仅达不到张扬女性意识的目的，反而走向目标的反面，走向庸俗，成为无聊看客的谈资，乃至败坏读者大众的心灵。

（原载《文艺争鸣》1997年第5期）

^① 陈骏涛：《“女性文学”刍议》，《光明日报》1995年4月11日；杨颖《女性私人小说是否昙花一现》，《中华读书报》1996年8月28日。